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91

身体与民族：民国时期岭南武术与民族国家建构

黄昊昱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民国时期岭南武术作为连接身体实践与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 为解码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研究发现, 武术通过科学化训练体系构建国民身体规训、跨国符号生产强化国家文化认同与宗族网络动员整合地方社会资源, 实现了从地方性技艺到国家文化符号的转型。民国时期岭南武术的转型揭示了一条关键规律: 民族国家建构需通过身体实践将抽象意识形态具象化。岭南武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张力, 揭示了文化认同建构需在守护基因与创新转化间寻求平衡的历史规律, 同时也为全球化时代非遗活态传承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 岭南武术; 身体; 民族国家

一、引言

在民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历史语境下,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或技击艺术, 更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文化现象和精神象征。特别地, 武术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而岭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与文化生态,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岭南武术文化, 成为了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处南海之滨, 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 所以岭南武术在近代化进程中较早接触西方体育与军事技术, 同时又依托宗族伦理维系着“以身为器”的技艺传承体系, 形塑了其独特的发展路径,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张力能够使岭南武术作为观察民族主义如何重塑身体实践的典型范例。对岭南武术的深入研究, 可以更好地理解岭南武术作为一种身体实践, 在这一时期如何成为连接个体、社群与国家认同、传统与现代的重要纽带, 以及它如何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

身体政治理论强调身体是权力运作的微观场所, 政治权力通过规训、训练、医疗等手段实现对身体的控制。身体既是被压迫的对象, 也是反抗的载体。武术作为一项典型的身体实践, 它的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国家与社会在身体层面的权力博弈, 这种动态关系至今仍影响着武术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这也是引入身体作为研究视角的原因。相关研究认为, 民国时期岭南武术通过“科学化”转型和制度化推广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例如, 精武体育会等组织通过“以武强国”理念, 将武术与救亡图存相结合, 塑造了“新民”形象。政府通过体育议案将武术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强化其作为“国术”的政治象征意义。岭南武术的“身体实践”被赋予双重功能: 既强健国民体魄, 又通过文化符号传递民族认同。身体政治理论认为, 武术通过规训国民身体实现“国族化”转型, 董刚等学者 (2022) 指出武术从“末技”到“国术”的话语蜕变, 完成了“身体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塑造”, 武术通过规训国民身体实现“国族化”转型^[1]。这一转变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革新, 更折射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身体的改造诉求。张震等 (2021) 进一步提出武术作

[作者简介]

黄昊昱 (2001—), 女,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24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一般项目)《身体与民族：民国时期岭南武术与民族国家建构》(项目编号: YCYB2024101)成果。

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身体映像”，在近代民族危机中承担起规训国民精神的重任^[2]。

基于既有的研究基础，本研究将武术实践中的身体视为权力与认同的双重载体，尝试从以下四个维度解析民国岭南武术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机制。

二、科学化改造与武术现代化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之下，岭南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科学化改造与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武术“身心合一”哲学的重构，也是国家权力通过现代知识体系重塑国民身体的治理实践。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复杂社会背景之下，国家和社会面对着“东亚病夫”的耻感叙事对民族身体的污名化，武术也被更多地赋予了保家卫国的情感因素，民国时期空前高涨的“强国强种”思想更是激发国人对武术的无尽热情。武术在当时的兴起反映着国人希望以武术强身、救国的迫切愿望。在西方体育的冲击之下，武术界需要以身体的科学规训为突破口将传统技艺转化为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文化资本。

在身体技术的标准化改造层面，民国政府通过教育体系将武术纳入国民身体锻造工程，武术被纳入学校体育课程，成为正规教育的一部分，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也推动了武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这一时期武术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综合了多种研究手段，例如中央国术馆以解剖学解构传统身体认知，通过引入生理学与解剖学原理，对传统武术进行技术解构与重组；洪拳的“工字伏虎拳”被拆解为弓步、马步等标准化动作单元，形成可量化考核的教学模块。这些科学方法的应用为武术的科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个重要的武术组织是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的历史可追溯至1910年，由近代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在上海创立，初名“精武体操学校”。霍元甲逝世后，陈公哲、卢炜昌等核心成员着手组织重构。1915年社团正式订立章程，明确“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出自《中国精武体育会章程》）。其课程体系包含技击、文事、游艺三大类，其中技击部设置徒手、器械等标准化训练模块，并通过“强种救国”的民族主义口号将武术纳入国民教育体系^{[3][4]}。此后凭借系统的教学体系与广泛的社会活动，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体育组织。随着精武的南传，1919年，广东精武会宣告成立，随后数年间，佛山、阳江、汕头等岭南城市及港澳地区相继建立分会，同时向南洋地区拓展，形成以岭南为中心的传播网络，使“精武主义”思想在岭南大地传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对岭南武术科学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5]。

在身体符号的现代性阐释中，岭南武术家通过跨学科知识重构身体的民族寓言，重构传统技艺的合理性，开始运用西方数学、物理等方式来研究武术，揭示其内在的科学内涵。岭南武术家林世荣在《虎鹤双形拳谱》中采用西洋解剖图解析招式发力原理，将传统武术玄妙的“内劲”概念转化为肌肉群协同作用的生物力学模型。中央国术馆推动的竞技武术评分体系，将“腾空摆莲540度”等动作列为难度考核标准，标志着身体技能的量化竞赛机制形成。总体来说，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不仅提升了武术的理论水平，也增强了其在社会中的认可度。

然而，科学化改造也暴露了传统身体哲学与现代规训的深层矛盾。标准化教学虽提升了武术的普及性，但这种改造遭遇了传统武术界的激烈争议，传统武术“重意不重形”的哲学精髓被简化为肢体动作的机械组合，佛山鸿胜馆蔡李佛拳传人批评标准化训练导致“招式僵化，失其神髓”“拳术神韵流失”，反映出科学理性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冲突。这种争议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困境——民族国家建构既需要借助现代性话语重塑传统文化，又面临文化本真性流失的风险。

三、社会政治变革中的武术角色

在民国前后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岭南武术发挥着地方治理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岭南武术的发展与地方治理的互动贯穿了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整个历史进程，这一特性体现在社会组织、军事防御和治安维护中，还深刻影响了地方文化认同与社会秩序的构建。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通过军事开拓和羁縻政策逐步将岭南纳入统一治理体系，武术是军事经略与文化整合的一种手段，如南越国推行的“和辑百越”政策，将中原武术与岭南土著格斗技术融合，形成了早期武术的雏形。到了宋元与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武术在地方社会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宗族武装与基层治理。从宋元时期岭南地方豪族通过组建“弓箭社”“忠义巡社”等民间武术组织，承担保境安民的职能，到明代中叶，常有倭寇侵扰东南沿海，这时岭南的宗族势力进一步呈现军事化的特点。许多地方通过“筑寨建围”形成宗族武装联盟，以武馆和秘密结社为基础，参与镇压地方叛乱的武装活动。古代岭南地区宗族械斗频繁，武术也成为了争夺资源的核心工具，地方官虽尝试立法约束，但宗族武术团体仍长期主导基层治安。

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岭南武术的身体实践更是深刻嵌入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网络。民国时期，岭南武术团体通过设立武馆、参与地方自卫队等方式，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非官方力量，

也作为权力博弈的文化资本。如佛山鸿胜馆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组织工人武术队维持治安,将蔡李佛拳术改编为适合工人习练的“工会防卫十二式”,招式简化为直拳、勾拳等实用动作,并融入罢工口号作为训练节奏口令。由此可见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在武术领域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1934年广东省政府颁布《国术团体管理条例》,要求武馆“所授器械技击须报县党部核准”,试图通过技术审查强化国家管控。但地方势力通过武术组织维系自治,如番禺沙湾何氏宗族武馆加入抗日武装,将传统棍术改良为战术工具。这种分化折射出武术作为“身体政治”工具的双重属性:佛山部分洪拳团体被伪政权收编,其训练内容被用于搜查抗日分子,凸显武术在权力博弈中的道德模糊性。

岭南武术的身体实践成为观察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显微镜。从鸿胜馆的阶级身体动员到宗族仪式的权力再生产,身体既是权力角逐的战场,也是文化遗产的载体。这种身体政治的双重性,既折射出现代国家建构的复杂性,也预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转型。

四、国际传播与民族形象塑造

在民国时期的跨国场域中,岭南武术通过华侨网络与商业电影双重路径,成为塑造民族形象的文化媒介。精武体育会南洋分会将洪拳“工字伏虎”改编为团体操,配合舞龙舞狮形成“中华文化嘉年华”,通过标准化身体规训规避殖民审查,又强化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潮汕地区的南枝拳通过“老爷生”神诞巡游进行社区展演,武术家扮演的“青面虎”在锣鼓节奏中完成“三扑三剪”动作,将武术套路转化为信仰仪式,成为离散族群维系文化记忆的身体实践^[6]。

岭南武术的海内外传播不仅是技艺的扩散,更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身体书写。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黄飞鸿(1847-1925)作为岭南洪拳宗师,他的身份在民国时期已被叙事重构。更随着这一形象的影视化,实现了从民间武师到民族符号的升格。据统计,近百年来载香港制造了百余部“黄飞鸿电影系列”;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台湾)共产出14部344集以上有关黄飞鸿叙事的电视连续剧、20余部黄飞鸿题材小说,以及还有上千集的黄飞鸿故事无线电广播和1500集以上黄飞鸿传奇报纸连载。黄飞鸿系列电影在中国和美国好莱坞银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与新派武侠小说、霍元甲系列并列的三大中国现代武功文化叙事系列之一^[7]。影片中标志性的“虎鹤双形”招式被编码为“东方智慧”的视觉符号:虎形象征力量,鹤形代表灵巧,二者的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刚柔并济精神的具象化表达^[8],岭南地域文化深入其中。影片中360度旋转踢击动作经电影慢镜头处理成为与西方拳击对抗的文化隐喻。这种身体叙事通过身体暴力的奇观化展演,解构了“东亚病夫”的殖民想象,这样的对抗外国拳师的情节设计,在国外华人社群引发强烈共鸣,使武术成为华侨建构文化认同的身体文本。

武术的国际传播折射出离散社群的身份策略。华人群体通过武术展演,既回应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也重构了文化主体性。旧金山致公堂以洪拳“三点半棍”作为身份暗号,海外同乡需通过特定招式应答确认宗亲关系,这种身体密码既维系了群体边界,又规避了排华法案的语言审查。国民政府授予新加坡精武会“宣扬国术”匾额,标志着武术团体从地方组织升格为国家文化符号,将武术升华为柔性外交资源,在全球场域中塑造着“尚武不屈”的中国形象^[9]。但在跨文化传播中,武术符号面临意义偏移的风险,美国媒体将咏春拳解读为“反抗殖民的暴力美学”,完全忽视其“止戈为武”的哲学内核。这种误读揭示文化传播的深层矛盾——本土文化基因与异域接受语境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

跨国场域中的岭南武术身体实践,既是文化抵抗的柔性武器,也是身份重构的流动文本。武术身体始终在传统基因与现代性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动态调适既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智慧,也暴露出后殖民时代文化传播的深层悖论——身体作为最直观的交流媒介,往往最先遭遇意义流失的风险。

五、宗族、信仰与武术的互动

在岭南社会的历史文化肌理中,宗族制度与民间信仰构成了武术传承的双重根基。宗族通过祭祖、建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等方式组织化,成为维护乡村稳定的重要力量。由于岭南地区老百姓社会阶层较低、社会治安较乱、匪寇祸患较多,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宗族武术盛行的风气。如蔡李佛拳的传承体系便是以新会陈氏宗族为核心,依托族规将“师传”与“家族传承”相结合,要求习武者恪守武德与宗族伦理,并通过族田租金维持武馆运营,形成“以武养族,以族护武”的共生模式。另一个著名的拳种洪拳也具有庞大的宗族化网络,由族长兼任拳派掌门,借助宗族力量扩大影响力。宗族间的资源争夺与防御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武术的实用化转型,如客家土楼内的桩法训练和洪拳的硬力对抗技法,都是直接服务于宗族械斗与联防体系,甚至将武术训练融入龙舟竞渡的划桨发力技巧,使武术成为宗族生存竞争的工具。宗族伦理还通过仪式化操演渗透武术实践,将身体实践与宗族伦理结合。岭南关氏祠堂定期举行演武祭祖仪

式，这种活动体现了宗族作为文化中介的功能，通过礼仪标识将地方传统与民族国家建构相联结。在拜师仪式中，传统武术强调严格的师徒关系确立程序，包括引进、考察、递贴、行拜师礼等环节，确保技艺传承的封闭性与伦理约束。若有子弟违反伦理规范，宗族可通过革除习武资格等方式强化治理，这种权力源于宗族对武术传承权的垄断，体现宗族通过身体规训实现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则为武术注入了神圣性与仪式功能，两者在祭祀展演中形成了深度互嵌。如粤西年例驱傩仪式中的短打标掌，是以模仿神灵征战场景强化信仰权威，同时彰显武术的实战价值。醒狮活动更成为宗族整合的象征，广宁县的宗族通过狮头制作祈福、舞狮收入修缮族田，将“采青”“梅花桩”等高难度动作与宗族荣誉绑定，使武术表演成为凝聚血缘共同体的文化纽带。武术流派本身也构建起融合三教思想的信仰体系，蔡李佛拳的“形神合一”桩法修炼、洪拳与道教符咒结合的铁线拳功法，都赋予了武术超越性的精神维度。这种信仰与技艺的交融，使得武术既是肉身修炼的技艺，也成为沟通人神、安顿心灵的文化实践。这种武术与宗族、信仰的三维互动，本质上构成了岭南地方社会整合资源、维系秩序的文化策略，既借助宗族制度实现武术传承的在地化扎根，又通过信仰仪式赋予武术超越世俗的神圣意义，最终在民国动荡的时局中形成兼具防御功能、文化认同与精神寄托的生存智慧。

六、结论

民国时期岭南武术的历史实践揭示了传统身体文化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机制。通过科学化训练、跨国符号生产与宗族网络动员，武术从地方技艺转化为兼具规训工具与认同载体双重属性的国家符号。民国时期岭南武术的转型路径表明，传统身体文化并非被动消解于现代性浪潮，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能动力量。

参考文献：

- [1] 董刚,金玉柱,陈保学,等.民国时期中国武术的身体政治逻辑及其现代意义[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01):63-70.
- [2] 张震,金玉柱,陈新萌,等.中国武术文化的三重映像[J].体育文化与产业研究,2021,(01):148-167.
- [3] 栗庆英.民国时期武术组织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4] 张银行,郭志禹.公共服务视阈下的民国武术社团组织研究——以精武体育会为例[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01):35-39.
- [5] 郭春阳,王晓东.论精武粤传的成因与意义[J].搏击(武术科学),2013,10(12):26-28.
- [6] 林伟贤.南枝拳技术表现特征及其适应性分析[J].武术研究,2024,9(10):9-12.
- [7] 姚朝文.黄飞鸿功夫电影海外传播路线及文化影响力分析[J].文艺研究,2010,(07):99-106.
- [8] 姚朝文.乡土中国创造文化想象的世界奇观——百部黄飞鸿电影吉尼斯纪录的启示[J].学术研究,2013(3):134-137.
- [9] 郭玉成,许杰.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的武术传播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5(2):76-79.

Body and Nation: Lingnan Martial A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tate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Haoyu Hua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ngnan martial art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connecting physical practice and nationalism, provided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decod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study found that martial arts has achiev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ocal skills to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rough a scientific training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the production of transnational symbols,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lan networks, the mobi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ocal social resourc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ocal skills to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ngnan martial art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revealed a key la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tate needs to visualize abstract ideology through physical practice.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Lingnan martial arts reveals the historical la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needs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guarding genes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Lingnan Martial Arts; Body; Nation-state